

文化的惯性与出轨

——欧洲田野笔记

陈跃红

我在欧洲做过一段关于中国人在异文化境遇中的文化处境考察，颇发现一些又有趣又吃惊的文化变象，有的令人会心，有的令人喷饭，有的令人惊愕，有的则令人难堪。许多本土文化的经验和惯性，常常会在这种跨文化的环境下失效和脱轨，并不时地将执著于本土经验的当事人抛掷于尴尬的境地中。

譬如人类的族群认同意识，在各自的文化环境中就是一种维系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文化经验。俗话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在家中人们理所当然地认同家庭和宗族，而在国内，由于所处地域的范围，也有不

同的族群认同，诸如某乡人，某县人，某市人或者某省人，当然也还有以职业和教育等多方面的认同，所谓同乡会，校友会乃至专业社团之类，就是认同的方式体现之一。不同的人群各自都有其认同、对话和倚赖的群体。这种认同意识在历史传统中逐渐成为人的文化经验和生存惯性，一旦有事，首先就是去向最贴切的族群寻求理解和支持。按理说，似乎也可以将这种族群认同意识引申到跨文化的领域，既然到了国外，按说就该称某地区某国人了，民族的认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，因为既然我等是中国人，炎黄子孙，华夏同胞，但凡有点什么

事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首选的自然就该找黄皮肤，黑头发，口里吐出普通话及其方言的一类主儿了，光凭这肤色和语言，八成就该得到认同，况且还有文化啦！传统啦！祖宗啦什么的，五百年前说不定还在一只锅里搅稀粥呢，不找他们还能找谁去？可是真到了外边，这种地方文化的经验竟莫名其妙地就失去了效用，或者说部分地失去了效用，至少在我的经验中是如此。下面不妨略举数例，供读者诸君品鉴。

一

初到国外，熟悉的朋友就好心地向我传授了一堆国外生活的经验，其中的一条竟然是：出门在外，但凡有事，宁愿找警察，也别胡乱地去找你不认识的中国人。对这一条我颇感诧异和不理解，可到底也没有放在心上。然而事隔不久，朋友的提醒就开始兑现。

一天我和一个同伴到阿姆斯特丹机场接人，电脑屏幕上显示晚点半小时，我们就到该班机的出口通道附近坐下休息

瞎聊。片刻又来了两位，听讲话就知道是来自和我等一样的土地，况且周围都是一群黄发蓝眼，特征明显的非我族类，所以他两人往那儿一站就显得突出和扎眼。看他们一会儿东张西望，一会儿扳起腕子看手表的样子，必定也是来接站的。但是，两位仁兄显然没有看懂屏幕上用荷英两种语言的晚点通知，神态既茫然又不安，互相提示着是不是时间或者出口弄错了，身体语言透着焦急，并且几次迟迟疑疑地移动脚步，有向那些“老外”打听的样子，可最终没敢开口，也不知是语言障碍还是怯场。而我俩就在其眼光所及之处，但他们竟压根儿就没有光顾的意思，看起来真是有点同“族”相斥的味道。就这样折腾了怕有十多分钟，我的族群认同意识促使我站起来向他们走去，且扬手近身打了个招呼：“喂，你们好！有什么事吗？”对方立刻起了反应，可这反应却大出意料。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，后退半步，瞧贼似的一言不发地死死盯住我，那神色简直不可思议，仿佛我是什么怪物，弄的我对自己

都疑惑起来。赶快低头看看自己身上,没有什么嘛!瞧我这身穿着,尽管不是西装革履可也还算入乡随俗,不至于太寒碜;再看这张脸,虽确实不英俊,可也没有脸露凶像,面带杀机;至于动作举止,谈不上绅士风度,可怎么看也不会是个黑帮伙计或者往海外贩卖人口的蛇头吧。确信不是我的问题,我就干脆再往前走进一步,又问一句:“需要帮忙吗?”同时也用眼睛静静地看着对方。约莫几秒钟的沉默,在我的内心上却像是大战前的漫长等待。其中一个穿灯心绒休闲上衣,瘦削脸的总算嗫嗫嚅嚅地吐出几个字:“飞机……晚点?这道门……是北京来的?”我一字一句的回答:“对,晚点,半小时,快到了。”二人的神情顿时一松。我以为接下来或许还会有个“谢”字,没想到没人再开金口,竟又是令人难堪的沉默,而且其中一个的眼神已经飘到邻近广告牌的女模特身上去了。我知道站下去定是多余,便决绝地一回身,走到椅子旁坐下。身边一直纹丝不动,稳如泰山的同伴轻飘飘地扔过来一句:“多事吧?”多年在外的他,看来已经是见怪不怪

了,而作为第一次经历此种不认同场面的我,却好一阵没有缓过气来。

特别是后来与和当地欧洲人打交道的经验一对比,你就尤其觉得这种国人之间在异乡的相互防御心理不可思议。因为平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大街上,无论走廊还是电梯间,所见之人,无论来自本地还是其他欧洲国家,也无论认识与否,只要你“嗨”地吆喝一声,便可以搭上话。但凡求助问事,总会尽可能给你满意的回答。他若有事也会坦直地找你,决不吞吞吐吐。楼道里若有 party,甭管认识不认识,你想参加的话,带上一瓶酒径直走进去就行,保管你刚到门口就有人向你微笑,彼此间并无防范,成为朋友也不难,至少,不会用盯贼的眼光拒你于五步之外。而这中国人是怎么啦!一出国就成了仇人?好像前三辈就已经不共戴天似的,还没靠近就严阵以待了,真是邪了门。

然而,俗话讲,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这里是指我耐不住寂寞,热情过度,喜欢找人聊天揽事的陋习。正是由于旧习不改,后来我在意大利各地游玩的时

候,又接二连三地碰上了同胞们防范的眼神,以致成为整个旅行过程中唯一最让人扫兴,但也印象最深刻的体验。

二

我是在观赏那座有名的比萨斜塔之后,在返回城内的时候碰见另外那两位仁兄的。顺便说一句,国内有人将由意大利人发明,却由美国人弄得风靡世界的烘焙饼(pizza)译作“比萨饼”,很容易让人误会为这是比萨地区人们的发明,其实,它和北部的比萨人无关,而是南部那不勒斯人的专利,所以倒不如就直接将它译做“皮扎饼”省事些。为了解决肚子的问题,我走到了路边的一家皮扎饼店门口,挑起布帘的屋檐下已经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了,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得正起劲。点了所要的品种后,我坐下静候侍者送来,顺便打量身边的食伴,他们对我并不甚注意,只管自己聊得高兴,咋一听仿佛是叽里咕噜的洋文,可仔细一辨别却是地地道道的上海话。我在上海读过书,虽讲不来上海话,听还马马虎虎,两人谈的是葡萄

酒的生意经,据说在国内喝干红葡萄酒已成为新的时尚,故倒腾洋葡萄酒能赚大钱,所以他们出国这趟亏不了。我坐在那里闲着没事,按捺不住便打问一声:“两位从国内来?”二人不约而同地转向我,略微停顿之后,其中一个竟很突兀地冒出一句:“I don't speak Chinese.”老天爷!我顿时目瞪口呆,仿佛大白天撞了鬼,好一阵没回过神来,木木的坐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。这是中国人在说话吗?如果说那意思是他们不会说中文,那上海话什么时候变成了中国人的外语?如果说那意思是他们不想说中文,那刚才说的上海话算什么?如果说他们不会说普通话,那又为什么听得懂我的问话?无奈,我只好改用英文,可没说两句,两人吭哧吭哧地挺费劲,很快又是一脸的尴尬和不自然了。显见英文也不怎么样嘛!此刻我真想揶揄几句,如果想冒充高等华人,还是先把英文练顺溜了,如果以为上海话可充外语,那不妨去对洋人念叨,别在中国人面前出洋相。说穿了,恐怕还是一种在外国和自己人打交道的奇怪心理,说不清是担心还是畏惧,也不知

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怕自己同胞知道。我所尤其不懂的是,他们究竟都在担心和畏惧些什么?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,我实际上什么也没说,一则是恐失厚道,更主要的是我孤身一人,得为自己的安全着想。幸好我的皮扎饼来了,于是便各自埋头到食物中去,遮过了谈话的尴尬,直到结帐完毕各自走散,连声再见也没有。

三

在威尼斯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很快乐。其中倒还不完全是因为这座被称之为亚德里亚海皇后的城市魅力,尽管她确实很美,很有历史和艺术内涵,但是,在我看来,这座城市正处在不断的衰落过程当中,城市的地基在下陷,海平面在升高,而且随着环境恶化,地球变暖,这一进程已经变得似乎不可逆转。其次也不是因为我在这里的时候,恰好赶上了闻名遐迩的威尼斯电影节。亲历其中你就会发现,这个在国内被宣扬得了不得的盛会,其实很有点名不副实,至少目前我看到的是如此,也就相当于一

个我们常见的展销会什么的,当地人和游客们都不怎么在意。有时候,我甚至觉得这里的夜间书市倒显得更热闹一些,灯火通明,人头攒动,很有那么一点气势。

我之所以快乐,一是因为天气极佳,以至那几天到了午夜还可以斜躺在运河边,看岗多拉的船夫竞渡,看水城灯火,听当地人伴着手风琴唱“桑塔露西亚”,那歌声沿着运河一直飘过去,飘过去……,二是无意间与两个英国流浪汉做了半天朋友,居然被他们引为东方同道,那时候我的衣着和做派也确实和流浪汉很接近,于是也就多少真正知道一点所谓“流浪”的西方意义。

关于流浪,可能的话,我会在另一篇文章里谈论它。眼下,我还是继续说我的族群认同困惑。离开威尼斯的前一天下午,在里亚托桥的码头上,也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要割人一块肉的地方,我在那里上了一条水上巴士,也就是那种编了号,规定了路线的班船。当时我正打算最后一次去一趟圣马可广场,到执政官官中欣赏委罗奈斯和丁托列托的一组大

型壁画。

刚上船,就见到二老一少的三个中国人,规规矩矩地坐在前舱居中的椅子上,老的显然是一对老夫妻,而那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,八成就是他们的孩子了,神情打扮近于那种在中国餐馆做工的温州人。这回我再没勇气冒冒失失地搭腔套近乎了,说不定又可能弄出什么尴尬来,所以只是管自己走过去,坐在他们侧面不远处的地方,一路欣赏两岸风光,可总还是遏制不住好奇心,目光有意无意地时不时会从他们身上扫过,略见关注和问讯之意。大约因为我这样多望了几次,三人似乎也注意上了我,虽未转身对视,但举动明显地有些局促和坐立不安,年轻人的眼神偶尔会急速地从我身上滑过,神色似乎略见疑惑和忧虑,几次俯过身去与老者低声说话,好像要作出什么决定。我此刻反而真的气定心闲,有了前几次的经验,这回我倒是想耐心静观一下,看看他们会如何动作?也许会转身打招呼,这当然合乎常理,合乎人情,真是最好不过;也许会像别人一样,不断用盯贼的眼光打量我,防备我,甚至就是不发一

文化惯性与出轨——欧洲田野笔记
言,那也没有关系,毕竟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;当然,也许终到会毫不理会我的存在而正襟危坐,直到各自下船,那也可以说是虽不近情理,却颇有生活的自尊和自信,也就随它去吧,总算是可以理解。偏偏出乎意料的是,我正琢磨各种可能的时候,三个人竟然站了起来,随即移向中间的过道。也就转瞬间,我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,他们莫不是要过来和我同坐聊天吧?他乡遇故人,尤其老年人……。然而就在我尚未回过神来时,三人已经与我擦肩而过,径直往后舱走去,并且很快在角落里坐了下来。让我大惑不解的是,后舱无窗,什么也看不见,而且闷热,去那里干嘛?此刻又没有风。一般的游客都在前舱和中舱,就他们仨孤零零地呆在后舱,何苦来着!突然那青年又走到前舱来,折身到刚才的座位方向去,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小包,原来是刚才落下了。再次经过我身边的时候,我从那青年的眼神中感觉到了一丝怨愤之意,这才顿时醒悟到,原来他们竟是为了避开我,远离我,以致不惜放弃观赏风景的绝佳位置和机会。一股深

深的悲哀之情从我的脚底直冲头顶，苍天有眼！我什么时候变成了国人见而惧之的妖怪？哪怕一言不发也可以将自己的同胞拒之于千里之外。看那后舱里静静坐着的二老一少，我竟然有某种犯罪的负疚感觉，便立刻在心里发誓，决不再看他们一眼！最后当我在圣马可广场上岸的时候，回首后舱，那里早已是空无一人，以致那一瞬间，我的心里也顿时有了空落落的感觉。其印象之深刻，以致很久很久之后，每每见到船只，那空空如也的后舱就会浮在眼前。

四

说实话，即使生活在国内，在人际交往方面也有不认同的时候，但无非是人所共知的衙门官僚的媚上拒下眼，或者是宾馆商店服务员的铜钱势利眼，不足为奇。大多数的老百姓，无论生熟，基本上还是和蔼可亲，极易交往的，试看不论是在硬卧车厢还是在轮船的统舱里，也不论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旅馆的四人间中，纵然来自天南海北，素昧平生，仅凭你是个中国人这一

点，片刻之间就可以递烟请茶，称兄道弟，一起骂领导腐败，抱怨物价上涨。怎么到了国外就变了味呢？

首先，我很难相信是因为我的缘故。毫无疑问，我不是坏人，不用别人告诉我，我自己就很有把握；我也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怕的人，这张脸虽不算和蔼可亲，但也还算中庸文雅，至少这副七百度的近视眼镜，多少也会给人以不足为惧的安全暗示吧？在国内旅行的时候极易与生人打交道。至于在国外旅行，每逢海关查证件，同行者被盘问多多，轮到我的时候，警察总是看一眼护照，挥挥手就放行了。我想他们心里都清楚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出不了什么大事。到欧洲以来，也真没见哪个洋人用警觉的目光审我一回。怎么就偏偏自己人和我过不去？事情逼得你没法不想想这究竟是为为什么。其实，真要是不想，也就没什么事，可越想就越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比如我完全可以顺着某种理论的思路将这事儿琢磨下去，什么传统与现代啦、自卑与信心啦，习惯与处世原则啦，人际关系与文化心理啦，以及中外交际

与文化差异之类的东西，甚至中国近代落伍史、国民性、改革开放都能给拉扯出来，还挺复杂的，认真起来够写一本学术著作，可眼下还真没这功夫。那就只好先从具体的事情上去揣摩。

就说我一路上碰见的这些中国人吧，多数其实看上去都不坏，甚至有的还老实巴交，怯生生的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你无论如何也没法将他们往坏处去想。他们对我这样的中国人的警戒和防备，一定有他们充足的理由，看来还是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？

有一段时间，我就这样一个人捉摸来捉摸去。后来干脆试着倒过来想，竟突然有所发现，原来他们视我如贼的最大也最充足的理由恰恰就是：因为我是中国人。

这不是危言耸听，一说你就会明白。如同我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打交道比较自如一样，同样的中国人，多数在国外与外国人打交道也未必会有多大问题，说不定比我还潇洒。问题就在于那是“外国人”，也就是“外人”，与作为中国人的“自己人”不一样。外

国人只不过是你一时的交流对象，他们作为对话者的合法性，就在于他是“非我”，你对他的要求就是要和你“不一样”。在这一点上，交流双方的前提要求是一致的，因此，就比较地不太“认生”，甚至常常一拍即合。而作为中国人自身在国外的交流就不行了，大家都处在同一文化造就的传统和习惯的网络当中，因此，就自然而然地会以这一传统的规范来加以特别的关注和要求，而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习惯却是比较“认生”的。从小父母都会教育孩子，不要与不认识的陌生人来往，不要吃不认识的人的东西，很可能里边有妖术或拐走小孩的迷药之类。长大了的中国人，无一例外地都生活在一个亲疏分明的人际关系网中，一切都必须靠“关系”，靠“熟人”，然后才能运作，才能办事，才能有所作为，也才觉得安全。即使是公事，大多数情况下也需要私办。所以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中国人不需要、不可能，也不应该和陌生的中国人打交道。至于旅途和公共场合的接近，往往是在有安全保障条件下的客套和无具体利益关系的公共话题，诸如天气、

腐败、物价之类。而一旦置身于已经失去了熟人和关系网依托的异国他乡，既缺乏安全感，又没有公共话题，于生人交往的多数基本前提就消失了，相反，陌生的国人倒成了自身跨本土文化行为的“窥视者”，所以必然加以防备。而一旦有像我这样的陌生人试图打破常规，毋需中介的就闯进来时，不仅让人觉得别扭，而且动机也显得可疑，值得警惕了。看来，莽撞冒失的倒反是我自己了。

不妨再往深处想想，我当时不仅不该是中国人，尤其不该是单独的“一个”中国人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人擅群聚而不擅独行，但凡特立独行者，必被视为异端，从而遭众人侧目。我注意到，在我的这些不愉快遭遇中，对方从来都是二人以上，具有中国人习惯的基本人际“关系”，而我却始终是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在外国风景名胜游荡的中国人，焉能不让人觉得可疑！可恨！国人旅游，不是组团，起码也得结伴，有我这样出游的吗？是好人，胆子也忒大了点，如果我是个歹人，那又当另说了，尽管看似面善，谁知道伪装后面包

藏的是什么祸心；再说，瞧我在生人面前那一副主动热情的样子，中国人有这样的吗？没准就是个陷阱，因此，要么别搭理他，要么趁早走开。总之是俺们不上这个套，惹不起还躲不起？得！闹了半天，多情反被无情恼，倒是我错了。可怎么就错得这样别扭，这样窝囊，这样让人耿耿于怀？我来欧洲做关于海外中国人生活状况田野考察的目的，是想了解国人在西方跨文化境遇中的文化处境，可不知不觉地就把自己绕了进去，研究者成了被研究者，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自己审视的对象。这种阴错阳差的玩笑真是格外有趣，因为它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据，说明跨文化的冲撞不仅仅是理论和学术的抽象，它完全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和处境，因此，关于此类文化现象的研究，除了宏观的趋势把握、理论的审查和逻辑的推导之外，恐怕当下更需要贴近现实的田野考察和微观分析研究，至少，这应该是将研究深入下去的有效途径之一吧。

1999/9/1